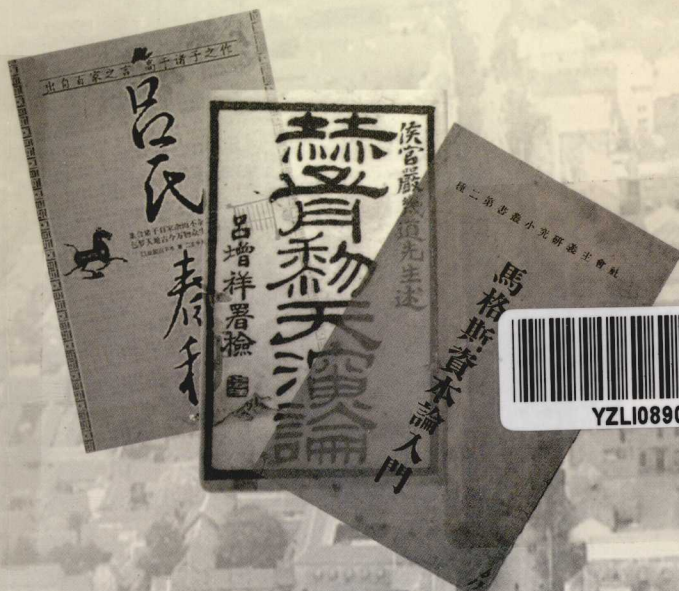


百年书评史散论

伍杰著



YZLI0890079212

BaiNian ShuPingShi SanLun

百年书评史 散论

伍 杰 著



河南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百年书评史散论/伍杰著. —开封:河南大学出版社,
2010.3

ISBN 978-7-5649-0156-1

I. ①百… II. ①伍… III. ①书评—文化史—研究—
中国 IV. ①G256.4-09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056965 号

责任编辑 李景奇
责任校对 木 子
封面设计 马 龙

出版发行	河南大学出版社		
	地址:河南省开封市明伦街 85 号	邮编:475001	
	电话:0378-2825001(营销部)	网址:www.hupress.com	
排 版	河南新华印刷集团有限公司		
印 刷	河南新华印刷集团有限公司		
版 次	2010 年 8 月第 1 版	印 次	201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开 本	690mm × 960mm 1/16	印 张	20.5
字 数	285 千字	定 价	38.00 元

(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河南大学出版社营销部联系调换)

前 言

图书评论的历史是悠久的,可以说有图书就有评论。据现在掌握的材料,在春秋战国时,书评就比较发达,它开始于诗歌文艺的评论,发展至历史、诸子百家学术著作观点的评论。百家争鸣局面的形成,和评论的发展是分不开的。最早是孔子对诗歌的评论,他说:“诗三百,一言以蔽之,曰:‘思无邪。’”“诵《诗》三百,授之以政,不达;使于四方,不能专对;虽多,亦奚以为?”这都是对《诗经》的评论,评论诗的思想内容是“无邪”,说诗可以用于应酬,通于政事。孔子的学生子夏还专门为《关雎》篇写了一篇大序,叫《诗大序》,其中说:“《风》,风也,教也。风以动之,教以化之。”“上以风化下,下以风刺上,主文而谏,言之者无罪,闻之者足戒,故曰《风》。”他评了《诗经》中诗歌的性质、作用。这大概是先秦儒家诗论的总结性文字,也是最早的有分量的书评。孟子对《诗经》也有过评论:“《小弁》之怨,亲亲也,亲亲仁也。”“《凯风》亲亲过小者也。”这时,除了这样的直接评论,关于诗歌的理论,也非常丰富;孔子还有对历史的评论,评史官董狐,说他书法不隐,是“古之良吏”。这一时期,诸子百家间的评论也很多,墨子写了一篇《非乐》,阐述对音乐的看法,这种评论有进步的一面,但有些观点也很片面,说音乐只是取乐的手段,说它是“亡国之祸”。荀子就不同意他的观点,专门写了一篇评论文章《乐论》,批评了墨子的观点,肯定音乐不仅有娱乐功能,而且能起教育作用,“可以善民心”,“移风易俗”。齐国的墨派学者,还全面地评论了墨子的学说:“墨子之说,传先王之

道,论圣人之言以宣告人。”韩非子对儒家也有评论,说“儒以文乱法”,批评儒家的理论不好。

到了两汉,随着文化的进步,学术的不断发展,图书品种的增多,书评也更快地发展起来。刘向、司马迁、班固、桓谭都是有名的图书评论家。刘向是汉朝著名的散文家和经学家,成帝时任光禄大夫,他校阅群书,编辑成了《别录》,他将每一部古代典籍进行校勘,然后写成提要,呈送给皇帝,提要中有原书作者生平主要内容、图书评介,对图书有正式的评论。他校订《战国策》,所写的序言就是一篇很好的书评,他的结论是:“战国之时,君德浅薄,为之谋策者,不得不因势而为资,据时而为画。故其谋扶急持倾,为一切之权,虽不可以临教化,兵革救急之势也。皆高才秀士,度时君之所能行,出奇策异智,转危为安,运亡为存,亦可喜,皆可欢。”这就是他对《战国策》的评论,从评书到评论时政,评论当权者,评论的范围很广泛。司马迁是有名的史学家、文学家,也可以说是个评论家,他在序言中就对许多著作进行了评论:“《易》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,故长于变;《礼》经纪人伦,故长于行;《书》记先王之事,故长于政;《诗》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,故长于风;《乐》乐所以立,故长于和;《春秋》辩是非,故长于治人。”这是他对文艺的评论。他还有许多其他方面的评论,如《孔子世家》中评论了孔子。对孟子也有评论,对儒林的一些名人,包括董仲舒,都有所评论。对诸子百家如老子、韩非子、荀子都有评论。他还评论司马相如和扬雄:“相如虽多虚辞滥说,然其要归引之节俭,此与《诗》之风谏何异。杨雄以为靡丽之赋,劝百风一,犹驰骋郑卫之声,曲终而奏雅,不已亏乎?”对屈原,他说:“屈平疾王听之弗聪也,谗谄之蔽明也,……故忧愁幽思而作《离骚》。”“屈平之作《离骚》,盖自怨生也,国风好色而不淫。”“雅怨诽而不乱,若《离骚》者,可谓兼之矣。”他还说:“其文约,其辞微,其志絮,其行廉,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,举类迥而见义远。”这可以说是很好的文学家评传。班固发展了书评事业,他的《艺文志》,除列举了辑略、文艺略、诸子略、诗赋略、兵书略、术数略、方技略七方面的所有著作篇目,还在每类书后面都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评论,讲了

这些书的发展,评了这些书的特点。这大概是最系统的评论书了。班固还有对小说家的评论:“小说家者流,盖出于稗官,街谈巷语,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!”对司马迁及《史记》也有评论:“其言秦汉详矣。至于采经摭传,分散数家之事,甚多疏略,或有抵牾。亦其所涉猎者广博,贯穿经传,驰骋古今上下数千载间,斯已勤矣。又其是非颇谬于圣人,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,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,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贫贱:此其所蔽也。然自刘向、杨雄博极群书,皆称迁有良史之才,服其善序事理,辩而不华,质而不俚,其文直,其事核,不虚美,不隐恶,故谓之实录。”

王充也是一位评论家,他的《论衡》中也有许多书评内容。在《佚文篇》中,评论了许多作者和作品,他说:“孝武之时,诏百官对策,董仲舒策文最善。王莽时,使郎吏上奏,刘子骏章尤美。美善不空,才高知深之验也。”“永平中,神雀群集,孝明诏上《神爵颂》,百官颂上,文皆比瓦石,唯班固、贾逵、傅毅、杨终、侯讽五颂金玉,孝明览焉。夫以百官之众,郎吏非一,唯五人文善,非奇而何?”评论中还特别讲到作品的教育作用、内容决定形式等问题。他评论得相当广泛。

淮南王刘安也是评论家,对《诗经》、《离骚》都有评论:“《国风》好色而不淫,《小雅》怨悱而不乱,若《离骚》者,可谓兼之……与日月争光可也。”

扬雄也是评论家,他评论屈原:“如玉如莹,奚变丹青,如其智,如其者。”“其文悲,读之,未尝不留涕也。”他还批评屈原的浪漫主义是“浮”,说:“过浮者蹈云天。”

王符,东汉学者,终身不仕,他评论汉赋:“今赋颂之徒,苟为饶辨屈蹇之辞,竞陈诬罔天然之事,以索见怪于世。”从内容、形式上都批评了汉赋。

东汉桓谭,也有书评言论,他对扬雄的《太玄经》就有评论。后汉王逸,也可以说是位评论家,他的《离骚序》,就是对《离骚》的评论:“依诗取兴,引类譬喻。”“其词温而雅,其文皎而朗。”

卫宏汉在光武帝时任议郎,作了《毛诗序》,这是一篇很好的诗评

文章,以“诗三百”为对象,联系作品,全面论述了诗的性质、特点、作用、表现方法,可以说是先秦到汉代儒家诗歌理论的总结。

杨修也是一位评论家,他很中肯地评论扬雄的词赋:“修家子云,老不晓事,强著一书,悔其少作。”对曹植也有评论:“兼览传记,留思文章,公乃念王(粲)超陈(琳),度越数子矣,观者骇视而拭目,听者倾首而竦耳。非夫体通而性达,受之自然,其熟能至于此乎?”他还评赞建安文学:“若仲宣之擅汉表,陈氏之跨翼城,徐刘之显青豫,应生之发魏国。”

这一时期,已开始通过注释对图书进行评论,最著名的注释家郑玄,他是北海高密(今山东密州)人,是著名的经学家,曾聚徒讲学,弟子上千人,晚年潜心著述,世称“郑学”,他注释《周易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尚书》、《诗经》等,以《毛诗笺》、《三礼注》影响最大。高诱注释了《战国策》;马融注释了《淮南子》、《离骚》;何休注释了《孝经》、《论语》,还作了《春秋公羊解诂》、《公羊墨守》、《左氏膏肓》、《穀梁废疾》;赵岐注释了《墨子》。

魏晋南北朝时期,评论工作也发展到相当高的阶段,代表作是曹丕的《典论·论文》,这是我国最早的文学专论。曹丕是这一时期最有成就的评论家,他强调文章的价值:“盖文章经国之大业,不朽之盛事。年寿有时而终,荣乐止乎其身,二者必至之常期,未著文章之无穷。”“不假良史之辞,不托飞驰之势,而声名自传于后。”他还批评了当时两种不好的批评态度:一种是“贵远贱近”,即厚古薄今;一种是“暗于己见,谓己为贤”,看不起别人,自以为了不起。他对建安七子孔融、陈琳、王粲、徐幹、阮瑀、应玚、刘桢,也都有评论:“斯七子者,于学无所遗,于辞无所假,咸自以骋骥騄于千里,仰齐足而并驰。以此极服,亦良难矣。”对他们的作品也都有中肯的评论。到了晋朝,陆机写了《文赋》,这是更为完整系统的文学理论作品,对文学创作、评论的许多理论问题,都有精辟的分析,可以说是文学批评史上的重要著作。

挚虞也是位评论家,他的《文章流别论》是系统的评论集,对古代的诗、颂、铭、诔、赋等形式的作品都进行了分类评论。他评论作品的

得失,都很中肯,可以说他是文艺理论的先驱。他的评论主张是:“文章者,所以宣上下之象,明人伦之序,穷理尽性,以究万物之宜者。”他还说文章应表示天、地、人、万物的形象,次序与道理。他推崇《诗经》,评曰:“夫诗虽以情志为本,而以成声为节,然则雅音之韵,四言为正;其余虽备曲折之体,而非音之正也。”他对古代的许多作者和作品也都有所评论。他的评论思想,对后世影响极大。

桓范也是位评论家,他在《世要论》中的《赞象》、《铭诔》、《序作》等篇中,评论了各种文体的得失,明确提出了重用轻文的主张,他说,“浮辞淡说,而无损益”,“务泛滥之言,不存有益议”,“故作者不尚其辞丽,而贵其存道也,不好其巧慧,而恶其伤义也”。

皇甫谧也是位评论家,他的《三都赋序》就是一篇评论,纵论辞赋的源流和创作。他对辞赋的要求,一方面求尽美尽丽:“赋也者,所以因物造端,敷弘体理,欲人不能加也。引而申之,故文必尽美;触类而长,故辞必尽丽。”另一方面,他又强调其社会功能:“纽之王教,本乎劝戒。”他还联系历代辞赋进行评论,赞扬屈原等人的赋:“因文以寄其心,托理以全其制,赋之首也。”对左思的写实原则,他很赞成:“其物土所出,可得披图而校;体国经制,可得按记而验。”他批评宋玉等人的辞赋:“淫文发乎,言过其实。”他批评司马相如写赋之虚假:“虚张异类,托有于无。”对扬雄、班固、马融等人的辞赋,他也都有所评论。他的评论标准是侧重于辞藻的华丽,重雕章逐采。

左思的评论,则主张文学创作必须真实:“发言为诗者,咏其所志也;升高能赋者,颂其所见也;美物者,贵依其本;赞事者,宜本其实。匪本匪实,览者奚信。”这也是他的评论原则,他反对不实之虚假,他批评司马相如的《上林赋》、班固的《西都赋》、扬雄的《甘泉赋》、张衡的《西京赋》是“假称珍怪,以为润色”。“考之果木,则生非其壤,较之种物,则出非其所。于辞为藻饰,于义则虚而无证。”

李充,重文采,评孔融的作品:“孔文举之书,陆士衡之议,斯可谓成文矣。”评潘岳的作品:“潘安仁为文也,犹翔禽之羽毛,衣被之绛縠。”评陆机的作品:“陆机议晋断,亦名其美矣!”还评论了其他作品。

范晔的评论注重思想内容,文章“当以意为主,以文传意。以意为主,则其旨必见;以文传意,则其词不流”。“文患其事尽于形,情急于藻,义牵其旨,韵移其意。”他批评只追求形似、以文舍意的倾向。

沈约,是齐梁文坛领袖,长于诗文,也是诗歌评论家。他主张辞末要表现出思想内容,“以情纬义,以文被质”。他赞扬潘岳、陆机:“擢旨星稠,繁文绮合。”他在《宋书·谢灵运传论》中评论了谢灵运的作品,也讲了自己的诗论主张,提出用平仄相间的整齐的声律去代替古诗声韵,把诗歌音律美看做文学第一义。他以声律为中心,批评诗歌,“至于先士茂制,讽高历赏,子建《函京》之作,仲宣《灞岸》之篇,子荆《零雨》之章,正长《朔风》之句,并直举胸情,非傍诗史,正以音律调韵,取高前式”;“王褒、刘向、扬、班、崔、蔡之徒”,“虽法辞丽曲,时发乎篇,而芜音累气,固亦多矣!”

到了南梁,评论有了进一步发展,刘勰的《文心雕龙》是著名的文学理论批评专著,结构严谨,体系完整。作者抨击了当时片面追求形式主义文风,主张文学要有社会政治内容,文质要并重,质尤为重要。他把文学理论批评推向了新的高潮。

齐时钟嵘的《诗品》,又叫《诗评》,评论了自汉至梁 122 位五言诗作家,对每人都进行了评论,评了他们作品的特色、好坏。《诗品》是系统的诗歌评论集。

到了唐代,评论专著已深入到了史学。刘知几的《史通》,是我国第一部史学评论专著,它评论了历代史书,全面深入地进行探讨和总结,评述了得失。

此后,评论越来越多,也更为广泛。从历史上图书评论的发展看,有这样一些特点:一是没有专门的图书评论家,往往是文学家、史学家、其他方面的学者兼而评论图书,这说明图书评论有一个发展过程。二是图书评论开始比较零碎、比较分散,由感想、随笔到理论,才逐渐系统化。三是评论和形式、内容多种多样,有整篇的专论,有序言,有评注、笔记。李白的“蓬莱文章建安骨,中间小谢又清发”,杜甫的“庾信文章老更成,凌云健笔意纵横”,“庾信平生最慕瑟,暮年诗赋动江

关”，这是用诗歌进行评论。宋代欧阳修的《六一诗话》是诗话中最早的，创造了一种新的评论形式。清代袁枚的《随园诗话》就是很有代表性的随笔诗评。此外还有19种诗话，宋代就有9种：杨万里的《诚斋诗话》，陈师道的《后山诗话》、《岁寒诗话》，严羽的《沧浪诗话》，姜夔的《白石道人诗话》，叶梦得的《石林诗话》，张戒的《岁寒诗话》，刘克庄的《后村诗话》，莫彻的《碧溪诗话》，吴可的《藏海诗话》。明代也有几种诗话：杨慎的《升庵诗话》，李东阳的《怀麓堂诗话》，谢榛的《四溟诗话》。清代有王夫之的《薑斋诗话》，何文燠的《历代诗话》，薛雪的《一瓢诗话》，王士禛的《带经堂诗话》。近代有梁启超的《饮冰室诗话》，林昌彝的《射鹰楼诗话》。此外，还有金代王若虚的《滹南诗话》。至于用评议、序言的形式评论的就更多了。朱熹就是最大的注评家，通过注释，对许多作品进行了评论。四是评论的主要方面是文艺作品，而且多从诗歌开始，主要内容也是诗歌、辞赋。虽然也有对其他图书的评论，但内容不多，不充实，不系统。相对来讲，文艺评论比较多，而且也逐渐系统。五是评论中也多是艺术风格、流派、技术方面的评论，涉及政治、思想内容、创作倾向的东西不多。明代张溥编了《汉魏六朝百三家集》，为汉魏到隋的103位诗人都写了一篇题词，这实际上是对这些专集的评论，合起来就是文学评论专集，也可以说是文学史。南宋魏庆之的《诗人玉屑》，也是对两汉以来的作家、作品进行评论。这些多是对艺术风格的评论。

最为难得的是明代万历年间的徐光启，为书评打开了一扇新的窗口，跳出历史的书评内容和风格，对西洋作品进行评论。明代西洋的传教士已进入中国，其中影响最大的代表人物是利玛窦，徐光启深受他的影响，读了许多西洋作品，尤其是自然科学类的读物。他认为自然科学读物对当时的中国最有用，所以，他极力评论，向国人推荐。他对评论西方科学著作作出了很大的贡献。他的评论文章有《几何原本杂议》、《刻几何原本序》、《勾股义序》、《勾股义绪言》、《简平仪说序》、《刻同文算指序》、《赤道南北两总星图叙》、《题测量法义》、《测量异同绪言》、《泰西水法序》、《甘藷疏序》等。他评论的范围很广，多与

国计民生有关,与数学、天文、测量、水利、粮食有关。他在评论中,肯定原著的内容,与我国有关科学作详细比较,分析不同特点,找出差异,阐述我国引进的重要意义,以图开启人们的思想。比如在《几何原本杂议》中,他说:“下学功夫,有理有事。此书为益,能令学者祛其浮气,练其精心;学事者资其定法,发其巧思,故举世无一人不当学。”“能精此书者,无一事不可精,好学此书者,无一事不可学。”“学此者,不止增才,亦德基也。”他还说:“昔人云:‘鸳鸯绣出从君看,不把金针度与人。’吾辈言几何之学,正与此异。因反其语曰:‘金针度去从君用,未把鸳鸯绣与人。’若此书者,又非止金针度与而已,直是开鼎冶铁,抽线造针;又是教人植桑饲蚕,涑丝染缕。有能此者,其绣出鸳鸯,直是等闲细事。”他把几何当做金针,度与别,使之绣出利国利民的鸳鸯。他对几何原本的评论,不仅寓意深刻,语言生动,目的性也十分明确,在三百多年前,能用这样开阔的思路进行评论,实在是十分难得。1853年在香港主办的一本中文刊物《遐尔贯珍》上,发表了对《伊婆菩喻言》、《地理全志》等书的评论,这是中国最早的中文刊物,也是最早的现代书评文章。

历史上的图书评论,起了很大的社会作用。社会不断进步,祖国的文化宝库不断丰富,学术水平不断提高,这些都和图书评论有极大的关系。第一,及时总结了科学、文化事业发展的经验。评论,代表一个时代的水平,也是科学文化发展到一定水平的标志。评论者的作品,来自作家、评论家,从许多作者、作品中提炼概括,由感性提高到理性,有一个升华的过程,也是一个总结的过程,通过总结,人们正确认识历史,评价历史,吸取经验,以便今后能更好地发展。第二,推动了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,提高了学术水平。在同一个时代,评论能促进学术交流,对后世来说,能促进发展。比如批评学术上的厚古薄今,早在东汉时桓谭就提出来了,他批评“尊古卑今,贵所闻贱所见”的观点是不对的,后来王充又发展了他的观点,直到曹丕在《典论·论文》中发展得更加完整,他反对“贵远贱今,向声背实”。这些思想,在当时,对学术著作、对各种创作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。春秋战国时,诸子百

家能得以发展,和评论很多、学术气氛很活跃极有关系。唐代诗歌能发展很快,成为我国历史上诗歌的鼎盛时期,原因很多,但和评论发达很有关系。当然,诗歌的发展也推动了批评的发展,它们互相影响,互相推动。批评也就是社会舆论,舆论好,作者的作品就更受人欢迎,更被重视,影响也更大。舆论能起导向作用,别人也起而效之,这就是推动。第三,推动了出版事业的发展。这里指的出版,是一个广泛的概念。据说最早的印刷是《金刚经》,那是唐代咸通九年的事,这时的印刷很落后,能印的范围很小。出版只能靠手抄,互相传抄,这在古代就是一种广义上的出版。推动传抄,也就是推动出版。有了印刷以后,通过评论,更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左右读者,也自然影响作者,这当然可以说是促进了出版事业的发展。

图书评论有自己的规律和特征。它离不开时代,体现一种时代特征,时代精神,随着时代的政治、经济、科学、文化的发展而发展,兴旺而兴旺,同时又影响和推动政治、经济、科学、文化的进步。它有依附性,也有独立性。所谓依附性是因为有图书才有书评,无图书便无书评。可以有文评、诗评,但这不是书评,书评依附于图书。所谓独立性,是不受图书的限制,可以自由地阐发自己的见解,伸延到书外,因书而论,言及他方,包括学术观点和政治见解,所以比较随意灵活。图书评论在百年历史的进程中,占有一定的位置,也发挥了相当的作用。

目 录

前言	(1)
现代书评的启蒙时期	(1)
民国初年的书评	(33)
20 年代的书评	(54)
30 年代的书评	(86)
40 年代书评简记	(168)
中国书评 60 年	(199)
新中国理论学术书评的发展	(284)
论书评家茅盾	(295)
论郭沫若评书	(303)

现代书评的启蒙时期

书评是时代的寒暑表,它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时代特色。1896年,对中国现代书评来说,开启了一个新时代。从这一年起,才有中国的现代书评。1896年严复翻译了《天演论》,写了评《天演论》的自序。从此,中国现代书评才逐渐兴起和发展。

1896至1919年是历史的大动荡时期,经历着改朝换代的大转折,也是去旧迎新的时代。书评也有着去旧迎新的色彩。清末,八国联军洗劫北京,清王朝与各国订立了许多不平等条约,中国人民备受封建主义、帝国主义的残酷压迫。后来,中国人民摧毁了封建王朝,迎来了民主共和的曙光,但是人们的希望落空了,得到的却是军阀混战,仍然是民不聊生。饱受苦难的中国人民特别是有良知的中国知识分子,在迷惘中,重新深深地思索,寻找新的出路。他们掀起了反对封建主义、帝国主义的“五四”运动。俄国的十月革命,给中国带来了新的希望。在大动荡、大转变中,人们的思想非常活跃。中国的仁人志士在多方寻找救国救民的良方时,引进了有关西方科学发展、资产阶级民主的大量著作,展开了评论。但是书评并不多,只能说是现代书评的启蒙时期。

清末是封建王朝垂死挣扎、苟延残喘的时候,也是西方列强残酷践踏中华民族的苦难时日。这是一个新制度诞生的前夜,黎明时刻。政局的激烈动荡,带来了各种思潮的风起云涌。新旧两种思想,形成了尖锐的对立。一种是改良派,保皇的资产阶级,主张改良、保皇,建

立不动政治制度的君主立宪国家;一种是资产阶级革命派,主张推翻封建制度,建立民主共和国,求得彻底革命。

1840年以后,中国农民起义不断,但都被帝国主义、封建主义镇压下去了。这一时期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,资产阶级逐渐走上了政治舞台。当它登上政治舞台时,就分化为两种思想、两种势力,一种主张改良,一种主张彻底革命。以康有为、梁启超为首的一派,先发动了震撼中国的维新变法运动,他们把维新的希望寄托在皇帝身上,他们劝导清王朝变法,希望通过君主立宪为大资产阶级争得权力,找到出路。随着革命潮流的发展,他们的主要精力用来反对革命派,他们宣扬的改良主张是行“公民制”,君忧可免、君权益尊、君利益大,否则人民起来争取权力,就会有“土崩瓦解之忧,君弑国亡之乱”了。他们代表封建势力、帝国主义势力及和他们有密切关系的知识分子的利益。与他们相反,民族资产阶级要求彻底革命,要推翻清王朝的统治,他们用种种手段,彻底揭露帝国主义的罪恶,痛斥清王朝“无一事不足以丧君大陆”,主张“暴动而后能有所创立,有所成就”,要“外拒白种,内覆满洲”。他们代表中小资产阶级利益,以知识分子为革命的一方。两军对垒,在对垒中,形成政治上的对立。两种思想上的对立,都通过图书、报刊上的文章、书评来表达。

从1897至1910年,办报刊之风十分盛行。这13年中创办的期刊就有477种,社会科学、自然科学、文学艺术、政治、经济、教育等各类刊物都有,除了期刊还有报纸,如《清议报》等。值得说明的是,这一时期,有些出版物似刊也似报,报刊难以明确界定。不论是期刊还是报纸,都发表过不同形式的书评文章。当时报刊是社会流行的重要传媒,很多主张,其中包括对图书的看法,只有通过报刊的宣传才能为更多的读者接受,广为传播。

一方面是革命的报刊,发表革命的主张,书评也是围绕这个主题。比较有名的报刊有《国民报》、《游学译编》、《大陆报》、《民报》、《新湖南》、《湖北学生界》、《浙江潮》、《童子世界》、《江苏》、《国民日报》、《黄帝魂》、《觉民》、《中国白话报》、《女子世界》、《河南》、《夏声》、《江

西》、《民心》、《越报》、《湘学新报》、《评书汇编》、《湘报》、《警钟报》等,这些报刊许多是在日本出版,反映了一批留日学生的主张。其中有些报刊原来是改良的,后来逐渐转变为革命的。如《国民报》,它的编辑沈翔云、秦力山,原是康有为一派的立宪鼓吹者,后来转变为革命派。《新湖南》、《湖北学生界》发表言论:“日日安坐而望政府,则亦日日安坐而就屠割。”“暴动而后能有所创立,有所成就。”“外人不过间接以亡我,而政府乃直接以亡我。”《中国灭亡论》中说:“欲立新国,必自亡旧始。”《童子世界》则谈“为外人之奴隶与为满洲。政府之奴隶无别”,提出“外拒白种,内覆满洲”的口号。《苏报》是“先主张立宪,后转变为革命”。1903年,《苏报》发表了邹容的《革命军》,章太炎为之写了一篇序言,他对《革命军》给予高度评价,认为是“义师无声”,还极力排满,“夫中国吞噬于逆胡二百六十年矣,宰割之酷……人人所身受,当无不昌言革命”。他大赞太平天国,骂李鸿章、曾国藩是小人,“吾观洪氏之举义师,起而与为敌者,曾、李则柔煦小人”。他赞扬《革命军》:“叫咷恣言,发其慚恙。”“谅以其所规画,不仅驱除异族而已,虽正教、学术、礼俗、材性,优有当革者焉,故大言之曰‘革命’也。”这当然是清代统治者所不能允许的,结果《苏报》遭封闭,邹容和章太炎被逮捕。这便是有名的《苏报》案。书评文章,遭遇了祸患。《游学译编》则主张:“经营革命之事业者,必以下等社会为根据地。”“下等社会者,革命事业之中坚也。”《中国白话报》中说:“天下只有穷人有革命的资格。”“中国愈穷,革命党愈多,革命军起得愈早,成事也就愈快。”《大陆报》则提出:“以欧洲大陆为师,以非洲大陆为戒。”刊物发表的书评《唯物论二巨子之学说》,极力赞扬唯物论的学说,是法国人爱读的“伟著”,“人民多读之而受其思想之范畴者,因是知国家、真法律之性情及道德上之自由,信公理而不信真神也”。“扫一世之陋说勿见,独立无惧自标新义。”“人当图此身之幸福,而不当图无据灵魂之幸福;当图实际之幸福,而不当图虚幻之幸福。”“必破宗教之迂说,除愚昧朦之勿见,而后见理既真,卓然独行,流万人之血而不顾,犯一世之怒而不恤,唯知有真理真福,而不知其他。”“共和事业,无一不自唯物

论来也。”他在评论中对唯物论推崇备至。章太炎在《民报》上还发表过书评《社会通论商兑》，评论和介绍英人甄克思的《社会通论》，这在当时影响也很大。革命已经是一股潮流，这些报刊和它们所刊登的书评文章，虽然受到封建王朝的镇压，受到保皇派的围攻，但他们有广大的读者群，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支持。这些书评文章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。

另一方面是改良派的报刊和书评。报刊的代表有《清议报》、《新民丛报》、《外交报》、《东方杂志》、《扬子江》、《中国新报》、《国风报》、《蜀报》等，代表人物有康有为、梁启超等。康有为在《辨革命书》中称主张推翻清王朝是“大怪不可解之事”，说清王朝历来对人民就是仁至义尽，开议院无须革命就能得到，革命就会亡国等等。公开为清王朝辩护，反对革命。除了政治性的书评，梁启超在《清议报》上还发表过《译印政治小说序》，他说：“六经不能教，当以小说教之；正史不能入，当以小说入之；语录不能渝，当以小说渝之；律例不能治，当以小说治之。”还说：“美英德法意日各国政界之日进，则政治小说为功最高焉，英名士某君曰小说为国民之魂，岂不然哉。”“今特采外国名儒所撰述而有关切于今日中国时局者次第译之。”这里的小说，实际上指的是随笔杂文时论一类的政治文章，他想通过这一类文章，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。其中，有些人的政治主张，也随着形势的变化而不断变化，开始是极力主张保皇，后来又变成虚君共和，到了民国初年，又帮助袁世凯复辟。这些人物，他们所支持的报刊及其登载的书评文章，虽然在某一时期内有一定的市场，但总是违反时代潮流的，为广大读者所摒弃。

如果仅就清末书评来论，这一时期总的倾向是政治性书评为主，兼及其他。从严复开始，以物竞天择的优胜劣汰天演论的思想评介西方学说，主要是从政治制度、法律、民主、议会、教育等方面引进西学，同时，评介科学、经济、技术、文学等有关著作。主体思想是希望用西学（包括明治维新后的日本）武装国人，用西方的办法治国，以达到使中国强盛的目的，随着政治矛盾的激化，在书评中也有强烈的反映。